

ZHONG GUO  
XIAN DAI

# 中国现代

# 文学史

吴军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广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教系列教材

# 中国现代文学史

吴军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 吴军著 . - 2 版 . -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4

ISBN 7-81004-303-X

I . 中… II . 吴… III . 现代文学 - 文学史 - 中国

IV .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5268 号

---

**中国现代文学史**

---

**作 者：**吴 军

**责任编辑：**范晓晶 杜丽华 张绍红

**封面设计：**大盟文化

---

**出版发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010-65738557 65738538 **传 真：**010-65779405

**网 址：**<http://www.cbbip.com>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75

**字 数：**362 千字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2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1004-303-X/K·230** 定价：27.00 元

---

**版 权 所 有** **影 印 必 究** **印 装 错 误** **负 责 调 换**

# 北京广播学院函授夜大教材编委会

编委主任：任金州

编委副主任：于佩玲

编委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杰 于佩玲 付 程

任金州 关 玲 李兴国

官希明 高晓虹 雷跃捷

编委秘书：高 萍 张绍红 张海峰

# 绪 论

—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指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为开端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的历史。

就总体上来说，这三十二年，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它的主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作为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有体现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又有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还有资产阶级的文学，甚至还有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利益的文学。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这里有进步与落后之分，积极与消极之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有革命与反动之分。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区分和对待。

一九一七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最早倡导文



学革命。他们的主张得到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响应。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共同向封建旧文学战斗。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它和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的文学变革和文学改良不同，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等方面全面的大革新和大解放。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主旋律，洋溢着逐渐觉醒的时代精神。在形式上完全摒弃了文言文和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模式，采用白话文写作，逐步创造了接近人民生活，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从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一页，把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两年之后，我国历史上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矛盾依旧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所不同的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崭新的政治力量从此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这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便由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从而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历史也步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诚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



作用的因素。”

在文学领域里，尽管成分错综复杂，但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并有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作为主流，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而且体现出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方向的崭新性质。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着不同的方式和特点。

在党未成立以前，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来实现的，“五四”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为主要特点。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学运动开始有了党的领导。当时，一批共产党人在一些进步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帮助作家认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神圣使命，对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对革命文学的倡导，为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左联”成立为标志，无产阶级对革命文艺事业的领导，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加强。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反文化“围剿”中披荆斩棘，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无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

抗战爆发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从组织上纲领上以及活动上都体现了党的领导。党对“文协”的领导，实质上是

对整个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进入了工农兵方向的新阶段，它说明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已经成熟。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它是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艺的。

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五四”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群众化或大众化的口号，但那时提倡白话文学，实际上反映了工农大众的要求。“左联”时期对文艺大众化问题曾经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探讨，但直到《讲话》发表后，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的解决。毛泽东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

第三，中国现代文学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宣言。鲁迅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之为“遵命文学”，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将令，这就确切地概括了文学与革命的密切关系。郭沫若的《女神》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深刻地体现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叛逆精神。茅盾的《子夜》更大规模地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现实，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赵树理的创作，紧密配合了抗战和解放战争，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战斗作用。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发扬了“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革新改造，更好地配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优秀的革命作家巴金、老舍、曹禺、田汉、夏衍，杰出的诗人艾青，体现工农兵文艺方

向的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李季等，还有一大批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文学新篇章的革命作家和文艺战士，如蒋光慈、殷夫、柔石、胡也频、叶紫等。他们的作品都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黑暗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其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如闻一多、朱自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坚强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硬骨头精神，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士。

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文学，也是统一战线的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文学坚持了统一战线，联合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以反帝反封建为其中心内容。文学上的统一战线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分化与组合。当时，尽管党内存在着“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讲话》中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统一战线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发展，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日益壮大。

有人把中国现代文学等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甚至认为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的看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和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烈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记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

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可宝贵的光荣传统。

二

在我们弄清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之后，接着要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突出的特点。

周扬同志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发生激烈变化的时候，可以从文艺上看出它的征兆。文学作为革命斗争极其敏感的神经器官，不可能不受社会阶级斗争总形势的制约和影响。三十二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难险阻、曲折坎坷的风雨历程，谱写了恢宏而壮丽的新篇章，从而光荣地完成了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

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从斗争方面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革命文学、进步文学反击和战胜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学、各种各样的错误文艺思想的历史。换句话说，一部文学史，也是一部文艺思想斗争史。革命文学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现代文学领域内的文艺思想斗争，就其性质来说，既有革命文艺与反动文艺之争，又有人民内部的种种文艺斗争，如无产阶级文艺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之争。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有关于文艺思潮的论战，也有创作领域中的矛盾斗争。

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显示着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特色，显示着它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文学。在“五四”时期，革命文学便和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学衡派”、“甲寅派”作了坚决的斗争。随着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还同新文学阵营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进行了斗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同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学”、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文化“围剿”进行过斗争。四十年代，同“战国策派”、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内

容为特色的“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戡乱文艺”等进行过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反击和战胜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艺思想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种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比如三十年代，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四十年代对“与抗战无关”论，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等等，都属于这类思想斗争。

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一般来说表现为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着领导权和方向道路问题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文艺究竟由无产阶级还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现代文学的方向究竟应该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问题。当然，斗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甚至也有斗争性质发生变化的时候。

文艺思想斗争的复杂性还表现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的论争，比如一九二八年前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四十年代关于“主观”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等等。

在现代文艺思想斗争中，还应当注意对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评问题。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犹如汪洋大海。对待数量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及其文艺思想应当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既不能采取“左”的简单粗暴的态度，又不能采取右的姑息、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应该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以正确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帮助他们以无产阶级文艺观点改造小资产阶级文艺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提供了这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

总之，“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在文艺思想斗争领域中有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评



价它们，认真加以总结，使我们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第二，从社会理想和美学观点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在文学中表现自己的历史。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主要是通过塑造生动具体的典型形象，描绘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心理，凭借这些有血有肉的感情形象来产生艺术效果，去教育读者感染读者的。从历史上来说，一切新兴的阶级都毫无例外地要求自己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作品中根据本阶级的社会理想、美学观点、道德规范来塑造并歌颂本阶级的英雄人物。诚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对文学有不同的要求。在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里，劳动人民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低下，往往是被忽视、被歪曲、被丑化的对象。随着无产阶级逐渐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理所当然地要求文艺正确地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文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在文学中表现自己的历史。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一开始就出现了劳动人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劳动人民还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人，所以在作品中出现的劳动人民形象，所表现的劳动人民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知识分子的手笔来完成的，是通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作家，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作家来表现的。“五四”以后，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人力车夫、手工业者、作坊学徒、工厂工人，他们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少是农民，《故乡》中的闰土，《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都成为当时不朽的名作。郭沫若的诗歌以高昂的激情歌颂了工农群众，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炭坑里的工人比作“全人类的普罗米修士”；把田地里的农民比作“全人类的保姆”。瞿秋白的《赤潮曲》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支战歌。它以磅礴的气势，

高歌“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他的小说《浪漫的狱中日记》真实地反映了“二七”运动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蒋光慈的小说《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反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和江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壮举，塑造了革命者和工农的形象。

在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中，也有不少反映工农劳动人民生活的。比如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烟厂女工和人力车夫不幸的生活遭遇，向旧社会发出了有力的控诉。

“左联”成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殷夫的红色鼓动诗，胡也频、叶紫的小说，茅盾的《子夜》等，都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作品中描写了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尽管这些形象还不够高大丰满，但毕竟比“五四”时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工农兵方向，这给我国的革命文学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许多作家深入了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涌现出大批描写工农兵、表现工农兵的优秀文艺作品。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欧阳山、草明、刘白羽，孙犁等的小说，李季、阮章竞等的诗歌，新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等，都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风格显示了它们是新的人民的文艺。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彻底地打破了少数人对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利用所接受，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使文艺真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使工农劳苦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

第三，从创作方法来看，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为更多的作家所乐于接受。

创作方法又叫艺术方法，它是作家、艺术家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



下认识、概括、表现生活的原则和方法。由于时代不同，作家艺术家的立场和世界观不同，以及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差异，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等等。不同的创作方法归根到底是适应不同阶级反映生活的需要，在不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文学艺术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是两大主要潮流。

综观三十二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它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宝贵的历史传统。

值得庆幸的是，在现代文学的发轫期就出现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显示出它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特色，表现了现实主义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为新文学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以及乡土文学派作家，将现实主义浪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左联”时期，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的创作，使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四十年代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李季、阮章竞等的创作，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翻身解放斗争的新现实生活。可以说，现实主义作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是贯穿始终并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作家乐于接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把它推进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新范畴。这里所谓“革命的”，是指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也就是说，作家站在先进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创作而言。茅盾等人的小说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了。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它总是吸取有益的东西来滋育自己补充自己的。无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我们都可以扎根在现实生活的沃土里，汲取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表现，本着吸取其精

华和“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原则，大胆吸收，认真借鉴。比如就影响颇大的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来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哲学基础、审美追求、表现手段诸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善于吸取它的某些表现技巧来丰富自己。鲁迅的小说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就是从安特莱夫等象征主义作家那里汲取借鉴过来的。曹禺的现实主义戏剧就吸取了易卜生早期剧作中的象征主义以及奥尼尔表现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手法。这里必须指出，当这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向现代主义的某些技巧借鉴时，总是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原则作为创作的基石的，并以此来融化吸收现代主义的技巧。这绝不是不加区别的盲目的生搬硬套和囫囵吞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艺只有在特定的肥沃的现实土壤里才能生根开花结果。那种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脱离民族需要的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是没有生命力的。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曾宗师于法国象征派大师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但由于这些诗歌写得过于艰涩难懂，很快就烟消云散销声匿迹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师承于日本的川端康成、横光利一、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等新感觉派作家以及弗洛伊德主义，但这个流派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兴盛起来。由此可见，大凡不适合中国国情和不适应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审美要求的一些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都会或早或迟失掉它的影响力，因而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还表现为一些非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在逐渐接近或转向现实主义。比如“五四”时期以浪漫主义著称的郁达夫的小说，随着现实斗争的发展和作家思想的不断变化，他后期的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分在不断地增加着。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连续写下的六个历史剧也有类似的情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诗歌，原受西方象征派的诗歌影响较深，到



了抗战时期他们的诗歌都很快转向了现实主义。在大变革的年代，一些非现实主义流派从各个方面不断地汇合到现实主义大潮中来，这也是现实主义潮流不断发展壮大原因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虽然没有象现实主义潮流那么壮大，但它从“五四”时期开始便以异军突起之势，给新文学注入了新血液。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优秀作家为代表的创造社诸作家所表现的浪漫主义特色，在新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同样对后辈作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主义是基础，这是最根本的。没有这个基础，文艺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浪漫主义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不是想入非非，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的理想，没有这种理想，现实主义就会流入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反之，浪漫主义如果不植根于现实土壤的养分中，它的理想之花便会枯萎，它就容易变成虚张声势或想入非非，这同样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凡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也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因素。至于说哪位作家愿意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这是作家的绝对自由。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史来看，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为更多的作家所乐于接受，这也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第四，从艺术风格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民族化、群众化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完美的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在反对欧化，反对割断民族传统、反对脱离群众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过来的。因此，民族化、群众化便成为我国现代文学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

所谓民族化，就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所

谓群众化，又叫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换句话说，文艺大众化就是要求文艺作品表现出工农兵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以便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流传。应该指出，民族化和群众化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民族化必须以群众化为根据，而群众化必须以民族化为前提。离开了民族化，群众化就不可能得到实现；离开了群众化，民族化也将失去方向。

“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随着党领导的加强和革命运动的深入，而有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翻译作品的大量出现，我国新文学受俄国——苏联以及欧洲文学的影响较大。当时，不少人看问题有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他们过多地否定民族的文学传统，无批判地接受外来事物，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民族化、群众化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鲁迅的小说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特色。他善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创造。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有着深入地研究和了解，对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现状，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有深入地观察和剖析，这使他的作品反映了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表达了民族的精神和气派，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尽管受歌德、海涅、惠特曼、泰戈尔等人影响较大，但由于他对我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厚，对民族的生活、心理、习惯、语言很熟悉，同样他的诗歌也体现了一定的民族特色。

到了“左联”时期，由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革命形势要求文艺作品更多地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要求文艺尽快克服它相当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左联”开展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